

关于中国目录学创新发展的几个问题

Some Issue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Bibliography in China

柯 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797(2014)03-0021-03 DOI:10.13366/j.dik.2014.03.021

从1983年至今30年来,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今天,目录学面临什么样的形势与任务,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兹撮其纲领,分述如下:

1 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和目录学传统的继承

这是每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的核心话题。中国目录学是国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直在坚守这样一个优秀的传统,但也需要有新的认识。刚才彭斐章先生就目录学的功能已经做了新的阐释,目录学不仅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而且是读书治学的必修之学。对目录学史的深入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刚才谢灼华先生的讲话中,谈到了目录学的细化和深化问题,并谈到要编撰一部有影响的中国目录学史。在文献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学领域,有四个史,我曾提出四史合一的问题,但并不是说不要独立的各史。四史之一,中国目录学史首当其冲,另三个史是中国图书史、中国图书馆史和中国图书馆学史。就目录学史而言,要完成一部集大成的中国目录学史,估计至少会有上百万字,如此浩大工程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此外,目录学史需要有新的方法,史料的挖掘,文本的阐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刚才王锦贵教授就司马迁的探究做了很好的范例。学术文化史的功能要进一步的回归,特别在今天浅阅读、碎片化的背景下,还要不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何发挥当代目录学的学术文化功能,是一个大课

题,应当引起重视。

2 关于古籍数字目录学

中国图书馆学会有一个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曾与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古籍数字化方面的会议,我在那个会上讲过一次古籍数字目录学的问题。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数字目录学的问题要提到议事日程,包括一系列的问题:如我们今天进行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怎样充分利用目录学的方法;还有古籍保护和数字化的矛盾如何解决,现在很多图书馆都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古籍得到了开发利用,但保护出现了问题,前些时参观一个图书馆,发现他们已经把古籍拆开进行扫描了,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古籍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扫描仪,书翻开就可以扫描,而不需要拆开,但是古籍的中缝扫不进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还有扫描中强光对书的影响问题等等。无论怎样,古籍数字化不能以牺牲古籍保护为代价,我们的先人们留下来的珍贵古籍遗产,不能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而加速了其损坏甚至毁灭。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古籍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应当作为其中的重要任务。还有一个大课题是古籍可视化,要利用可视化的技术开拓古籍整理与古籍阅读的新领域。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我们目录学家的责任。

3 关于数字阅读的目录学

目前图书馆界的阅读,主要是倡导全民阅读,倡导

[作者简介] 柯平,男,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文化服务,知识管理与信息咨询,文献目录学与图书馆管理, Email: ke2002@nankai.edu.cn。

纸本书阅读,倡导经典阅读,这些都是必要的,且对于传承中华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图书馆的社会价值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阅读的主体与客体都受到了数字化浪潮的洗礼,数字阅读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如果说传统阅读在年长者群体中拥有较多的支持者,那么,数字阅读则得到更多青少年的青睐。针对阅读当中的数字化,要不要导读,怎样导读?成为新的问题。最近几年,图书馆界兴起了推荐书目热,推荐的都是纸本图书,成人导读以经典图书为重心,儿童导读力推绘本,却少有人注意到数字文献的导读。随着手机图书馆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问世,图书馆移动服务中的书目仍然是揭示报道纸本图书文献,缺少对数字文献的导读,因此,传统的阅读心理学、阅读指导理论如何适应数字阅读的需要,如何发挥目录学在手机阅读中的导读功能?显得颇为重要,目录学界要以阅读社会为使命,研究数字导读书目和数字阅读学的问题。

4 关于文献和书目情报的未来

中国目录学与外国目录学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研究文献。自从书目情报的概念产生以后,给现代目录学赋予了新的内涵,形成了理论上的一个学派和实践上的一个专门领域。然而,过去目录学的研究只考虑已经形成的文献和书目情报,今天,文献和书目情报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突出地表现在:其一,文献的个体形态从物质多样化发展为数字多媒体化,传统的文献虽然多种多样,但物质形态易于识别,文献与文献之间有明显的界限,现代数字化的文献多媒体特征明显,数字形态难以识别,文献之间的界限打破,单一的文献形态已被混合的多元形态所取代;与此同时,传统的书目情报与文献分离的局面被打破,数字化环境中书目情报与文献融为一体,而且,传统的目录学方法很多也无法适应新型文献的揭示与报道。其二,文献的整体规模从有限的增加发展到无限的增长,传统文献一经产生,就以静态方式存在,而数字化环境将文献变成可覆盖的动态模式,文献数量已难以统计,文献的爆炸式增长、文献的泛滥等现象已不再是警示,而是现实存在的难题,在新形势下,传统目录学显然无法应对,原有的书目控制方法束手无策,不仅文

献规模到了大数据时代,就连书目情报也到了大数据时代。从现在开始,目录学不能只跟在文献和书目情报的后面做记录的工作,必须走到文献和书目情报的前面去,必须探讨预测文献和书目情报的未来形态,针对未来形态提出目录学的解决方案。数字书目控制应该是一个重点领域,特别是网页的控制变化很大,还有搜索引擎的书目情报功能,都应该是目录学的研究范畴。

5 关于目录学的方法创新

技术是推进信息社会的强大动力,对目录学的深刻影响也是革命性的。一方面,传统目录学对于文献揭示的各种方法如著录、提要、文摘、注释、书评等都是以纸本文献为对象、以手工为处理方式的方法,在网络化和数字化情景下,手工揭示的低效率早已被计算机所取代,但由于人工智能水平的局限性,使得自动编目、自动文摘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普遍应用,而自动提要、自动注释、自动书评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计算机无法替代传统的目录学方法。另一方面,传统目录学关于书目文献的三大工具——目录、索引与文摘早已实现了计算机编制,目录、索引与文摘工具的数据库化推进了目录学方法的计算机化(编制方法)、网络化(传播方法)和数字化(内容管理方法)。在新的时代,传统的方法仍有其应用范畴和生命力,需要继承;新的方法适应新形势,充满活力,需要开拓。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补充。比如,原来是书评方法,现在增加了微书评方法;原来需要文摘方法,现在需要超文献精髓方法;原来只讲计算机编目法,现在还要研制手机编目法,等等。总之,目录学界要进一步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与目录学方法的结合,加快新方法的创新与研究,形成方法体系,并建立目录学方法学。

6 关于目录学和信息素养的关系

目录学到了21世纪,目录学的视野有了很大的开阔,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将信息素养纳入目录学的范畴。目录学不仅关系阅读,即所谓读书治学之门径,而且关系信息素养,从工具书到文献检索,早就与目录学密不可分,且成为目录学家颇为用功之处。今天,新一代目录学人意识到,信息素养是目录学的使

命与任务。近几年来,目录学界加强了信息素养理论的探索研究以及信息素养教育的创新推动,由目录学专业委员会成功主办了系列会议:在 2011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贵州贵阳)上,主办了有关信息素养的分会场;在 2012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广东东莞)上,主办了“信息素养教育与文献检索课程建设”分会场;即将召开的 2013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海浦东),将主办“图书馆用户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新模式”分会场。从本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开始,专门将信息素养列为目录学研究的重大主题。目录学界下一步要组织信息素养教育的大型活动,出版信息素养丛书。未来的信息素养应该有目录学的位置,包括 E-Learning 中的目录学素养、E-Science 中的目录学素养;学科馆员应具备的目录学素养,学科馆员没有目录学的知识,难以做好工作;要把目录学知识纳入到信息检索课程中,实现信息素养与目录学知识的有机整合。

7 关于目录学人才和目录学教育

20 世纪 80 年代,目录学曾被赋予较高的学术地位,被认为是高层次的学问,因为没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学术文化基础,很难从事目录学的学习和研究。那时,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并称为图书情报界的三大学科,并毫无疑问地被尊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源头与基础;也只有目录学最早被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所认可并架设起与文史学界的桥梁,目录学的人才储备一方面得益于文史学界的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图书情报界学习目录学的热情,由此奠定了目录学人才在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直到 90 年代以后,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目录学不断被信息化的图书馆工作所排挤,目录学教育逐渐失去了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地位,目录学被边缘化的同时,不仅新一代图书馆人瞧不上目录学,就连原有的一些目录学学者纷纷改行投向其他学科,古典目录学无人问津,现代目录学发展缓慢。目录学课程在 80 年代是各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到了 90 年代,在信息化和改名的影响下,开始降为选修课,继而一些大学干脆将之从课程体系中砍掉,目录学教育一度跌到了谷底。在这种情势下,只有武汉大学、南开大

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少数大学还继续高举起目录学的旗帜,武汉大学目录学教育是最好的,图书馆学的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就是武汉大学以彭斐章先生为主讲教师的目录学课程。今天,当图书馆学教育界反思 90 年代的失误时,才深感曾遗弃目录学的错误以及重建目录学教育的重要性。新时代需要的目录学人才匮乏,比如图书馆急缺的人才包括古籍保护人才、古籍修复人才、版本鉴定人才、书目索引工作者。目录学人才是目录学创新发展的关键,为此,要制定中国目录学人才的未来规划,探索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实施中国目录学人才“工程”;要培养青年目录学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营造有利于目录学人才成长的环境,只有把青年目录学工作者和研究者发展起来,目录学的队伍才能壮大,目录学的人才困境才能得到彻底改变。目录学教育是目录学人才的保障机制和目录学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下一步要大力进行目录学课程的改革,加强网络化教学,加强与国学教育融合,加强与图书馆用户教育融合,实现目录学教育的转型。

8 关于目录学专业委员会的工作

2002 年 4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学术委员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倪晓建担任主任,王锦贵、柯平、王新才任副主任,2004 年 10 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以“‘网络信息文化’——新世纪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的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2007 年 5 月在重庆西南大学召开了以“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两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将目录学带入了新时代,实现了目录学的初步转型。2009 年 9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学术委员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柯平担任主任,王新才、郑建明任副主任。本届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连续四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举办目录学分会场,大力发展信息素养教育,大力发展数字目录学,发现和培养中青年目录学学科带头人,组织目录学力量进行目录学重大课题的攻关,充分发挥目录学的社会功能,为图书馆事业和信息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取得了标志性、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推进了目录学的创新发展。本届委员会 (下转第 11 页)

第四,目录学界应积极支持图书馆图书宣传与评介的活动。目前,一些大型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在图书宣传阵地上形式多样,生活具体,图文并茂,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但形式与内容应该提高,阅读指导上应该更加深入。总之,我们觉得,目录学研究上应该发挥那种实用、参与和提高的传统,那么,目录学研究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谈谈目录学研究的深化问题。2003年在重庆举行的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上,我当时谈了一个编写一本有份量、有水平、能立于学术之林的中国目录学史的问题。会后,李国新老师说要花力量编出来,我还与他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可能大家都有事没有时间进行了。我觉得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还不晚。确实,中国目录学史,在20世纪曾经出现过好几部。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够份量的。所以,在这里,再提出几点建议,供同行们参考。

首先,就是要使目录学理论条理化。譬如历史上的目录学理论著作,目录学思想和观点,我们对于它们产生的社会文化学术背景分析得不够,对于书目结构和著录事项的变化注意甚少,个人理论思想和观点与其流派风格和学术成就的联系,特别是学术观念的

变化原因和影响,必须更加深入地解剖,这样才能说明书目与学术发展的关系,才能准确地评论书目的成就和影响。

其次,相对来说,以前目录学史注意官修书目较多,注意私家藏书目录较少。而对于宗教目录,少数民族书目也研究较少。如果这些方面有了提高,都会使目录学更丰富不少。

第三,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方法对历史上书目资料作出整理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说明书目的类别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相信掌握较多的现代知识和技术的目录学研究者,其研究领域应当是相当宽广,而使用方法是不断进步的。

第四,运用当代阅读和评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代书目中的大序、小序和提要,并深入挖掘题跋的写作技巧与方法,使目录学研究上更具有深厚的人文视角与传统风格。总之,我觉得应该通过一部中国目录学史的编撰,使目录学研究上逐步深化和拓宽。

以上,也就是老生常谈,不当之处,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2014-03-15)

(上接第23页)

下一步要做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一是制定规划,面向未来,探索新时期目录学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机制,确保目录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学术交流,面向多学科领域,通过目录学与文献学的融合,加强目录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群体的交流;面向国际化,加强与国外目录学的交流,重视比较目录学与国际目录学的研究与发展;三是组织活动,要组织有影响的学术会议,研讨目录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还要组织各种推进事业发展的活动,如举办目录学新方法推介、书评创作、推荐书目展评等;四是出版著作,强化精品意识,组织目录学重要学术成果和科普著作的出版,普及目录学

知识,宣传目录学的最新成就,建立目录学成果奖励机制与评奖体系。

今天,我们在研讨目录学的传统、继承和发展,研讨目录学的未来走向以及将来如何承载目录学的历史使命,我们需要两种态度。一种态度需要跟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目录学要有新的发展空间。另一种态度,所有的学问都是有源的,目录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不能丢弃了源头与根本,目录学需要返璞归真,回归本源,找到恰当的定位。我们需要新的尝试,也需要本源的东西,两者不可偏废。

(收稿日期:2014-03-15)